

土地污染问题再“中枪” 中药重金属超标敲响谁的警钟？

■ 记者 蔡梦葵 报道

近日,同仁堂旗下药品连续曝出两起“汞超标”事件,中药材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中药的种植、生产、销售环节都可能导致重金属超标,而监管的缺位、涉事企业的推诿可能会给中药产业带来信任危机。

中药重金属严重超标引哗然

据相关消息显示,同仁堂旗下牛黄千金散及小儿至宝丸被曝汞砂成分含量分别是 17.3%及 0.72%,前者超国内标准,后者则远超香港标准。而汞砂主要成分是硫化汞,已经被证明含有剧毒。在美国、日本等国家被禁止入药。

同仁堂集团汞砂含量最多的王氏保赤散和七珍丸,已更改成分将汞砂排除在外。而同仁堂集团现有的定心安神、清热解毒等常用药品中,仍有近 40 种药品含有汞砂。在小孩可用药中,也有 3 成左右含有这种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同仁堂产品本月第二次曝出“汞超标”。5 月 7 日,香港卫生署公告称,一批名为“同仁堂健体五补丸”(注册编号:HKP- 08760, 批次编号:1033946)的中成药汞含量超标,要求同仁堂方面立即回收。公告称,该中成药用于成人调理身体,本不应含有汞。但经检测,其样本的汞含量约为上限标准的 5 倍。

资料显示,汞砂有安神、定惊,治癫狂、惊悸、心烦、失眠、眩晕、目昏等作用,牛黄清心丸、牛黄抱龙丸、汞砂安神丸、天王补心丹、安神补脑丸、苏合香丸、人参再造丸、安宫牛黄丸、牛黄至宝丹、牛黄千金散、牛黄镇惊丸、紫雪丹、大活络丹等常见中成药都少不了它。但汞砂含汞,容易汞中毒,严重者可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严控剂量就成为用药的关键。

中药的重金属超标引起社会一片哗然,有网民感叹道:如今吃中药也不安全!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中药重金属超标的现象并不显得那么出乎意料。传统中医使用的一些药物往往在国外并没有入药的传统,砒霜治疗白血病就一度饱受争议。因为砒霜虽然是剧毒,但却是传统中药的一种有效成分,这样双方在对中药的认识上自然就产生了分歧。

不过,该名人士同时也承认重金属超标在中药内可能广泛存在:目前我国一些中药材产地对农药与化肥的使用往往存在一些问题,不仅用量较大,而且还有一些剧毒性的农药仍在使用。而在中药材的初期制作过程中,还存在着用硫磺熏蒸等现象,这些都让中药材的安全性大打折扣。

而中药的整条生产链,目前尚未明确具体有效的管控方法。当前,国内对中成药的毒性监测、不良反应追踪等都做得远不如西药完整。因此,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很多环节都没有做到位。

另外,中药涉及上游农业环节,在种



植中药材的过程中,若其土壤、水源等含有重金属,较容易导致药材重金属含量超标。土壤重金属超标和农药残留也是目前中药材种植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

中药重金属超标 再度拷问土壤安全

由此,土壤、水源的重金属超标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当中。其实,在几个月前,湖南大米镉超标,就曾被不少人士怀疑是由于种植大米的土壤和灌溉的水源被重金属污染所致。多位专家表示,土壤镉污染主要来自采矿、冶炼行业,工厂排放废气中含有镉,可能会通过大气沉降影响较远的地方。据称,镉污染大部分来自开矿,工业排放的镉不是很多,主要来自冶炼厂。采矿和冶炼会导致土壤镉污染,此外,一些肥料中也含有重金属镉。即使冶炼厂距离远,其排放的废气扩散后也可能随降雨落到农田中。虽然 2013 年工厂的重金属排放标准较严格,但当地因多年来工业生产历史,加上管理不善等原因累计造成了镉污染。

由于化工、冶炼、采矿企业密布,湘江遭灾“矿毒”污染有上百年历史。统计数据显,湖南全省受到“矿毒”及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达 28000 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 13%。湖南 14 个市、州中,有 8 个处在湘江流域,超过 4000 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受到污染。湘江镉更是超标达 1800 倍。湖南的农作物中的重金属,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这些土壤和河流。

另据记者了解,在某市南部的农村,有一条贯穿全市的河流流经于此,这条河水的颜色已经发黑,并伴有腥臭,但当地不少农民仍主要取此河之水用于农作物的灌溉。该水源是否重金属超标,无人知晓。

由于我国农耕普遍缺乏有效管理,重金属通过此种方式迁移到食品药品里边,可谓防不慎防。而中药、菌类正好具有较

强的重金属富集能力,加之化使用同样不规范的加码,如此大环境下,重金属想不超标都难。

土地污染防治箭在弦上

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2010 年发布的《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 1 / 5 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 11 个省 25 个地区。南方省份土壤中重金属本来底值就偏高,加之多年来经济结构偏重于重化工业,大量工业“三废”排放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染形成。

要清除“重金属中药”、“镉米”等背后的祸害,最重要任务之一仍是全面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并尽快对已污染的土壤进行整治。而该问题实际上在几年前就不断被许多专业人士所提及。《中国质量报》在 2011 年就曾刊文指出:土地污染的治理实际上已很是紧迫。

该文认为:重金属超标的土地隐蔽性非常强,常常令人难以发现。如果土壤仅仅重金属含量超标或遭受轻度污染,庄稼非但不会遭受影响,有时甚至会“长得更好”。另外,即使大多数时候将真凶捉拿归案,解药却无处可寻。我们知道,土壤重金属污染一旦形成即具有不可逆性,很难恢复,远比水污染、空气污染治理要困难。目前,科学家们只有两种方法来对付隐藏在土壤中的重金属:一是在田地中播撒化学调理剂;二是种植易吸收重金属的富集植物。然而让人无奈的是,调理剂有可能伤害土壤本来的养分,而种植富集植物的治疗速度极慢。有时,即便将富集植物种上 10 年,一片农田也恢复不到清洁土壤的水平。

该文章作者表示,土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十分困难,但再难也必须得治理。当前,各地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作大都由政府花钱,而那些化工污染企业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集体企业,它们“污染赚钱走

人”,完了都让政府买单,实在是无奈之举。因此,要治理土壤污染,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尽快出台土壤修复法等相关法律与土壤修复的国家技术标准,使土壤修复有法有据;同时,要尽快明确“谁污染谁治理”(或者“谁受益谁治理”)的原则,理顺管理体制,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此外,要立足预防,建立相关的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基金,为生产中的污染及搬迁后土壤修复做好资金准备。

2011 年 2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足见政府对重金属污染的重视程度。该《规划》明确了重金属污染防治的目标,即到 2015 年,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 2007 年减少 15%,非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 2007 年水平,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此外,《规划》也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环境保护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研究制定《规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明确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责任,统筹推进《规划》实施。对《规划》实施达不到要求的地区,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各地要把重金属污染防治成效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不过,尽管防治土地污染的规划已出,但到目前为止,记者尚未查到治理土地污染的任何规划与办法细则。另外,2013 年 1 月底,北京律师董正伟向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2 月 20 日环保部书面答复,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大米、中药等在 2013 年陆续被发现染上重金属的阴影,也令人感到遗憾。

有业内人士指出,不让重金属污染继续未然我们的家园固然重要。但目前中国已有不少耕地与河流被污染,尽快出台具体的治理办法,也同样值得重视。

报告称北京人均住房面积约30平米

■ 郭少峰 报道

北京本地城镇户籍居民的住房数量已超过一户一套,基本达到一人一间的水平。但由于租金连年上涨,外来常住人口住房压力越来越大,住房状况甚至恶化。

7 月 2 日,北京工业大学、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社会建设蓝皮书(2013)》。报告称,8 成以上北京户籍城镇居民家庭居住条件在二居室以上;而绝大多数外来常住人口没有能力在京购房,只能选择租房居住。以 2011 年平均工资计算,即便房子租在昌平,房租也要占到工资的 4 成。

户籍人口住平房不足 10%

报告援引北京市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称:当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29.26 平方米。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北京户籍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质量较高,空间可以满足基本需求,部分家庭居室宽敞。这份报告认为,除了部分无房产,北京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基本需求大体得到满足,大多数城镇居民正处于追求住房质量的阶段。

81.3%的城镇居民家庭居住二居室、三居室、四居室或者独栋住宅,大多数家庭房间基本够用,达到一人一间。

按照住房类型分,89.6%的居民居住在成套住宅里,只有 0.8%的居民住在普通楼房里,9.6%的城镇居民住在平房或者其他住宅里。

与此同时,外来人口中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和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在京购买了商品房,其中有很多老板购买了很多套住房。

但“限购令”让外省市人口在京购房人数减少了 2 成以上。报告称,北京对外来人口限购住房以前,商品房的 1/3 被外来人口购买。限购令施行以后,外来人口买房比例大大下降 2011 年,外省市个人占购房购买者的比例只有 10.1%,当年外省市个人在北京购房仅有 21948 套。

逾 8 成新移民工人多数租“蜗居”

不过绝大多数外来常住人口没有能力在京购房,只能选择租房居住。蓝皮书强调,由于北京住房租金逐年上涨,外来常住人口住房压力也越来越大,住房状况甚至恶化。

2011 年,北京租赁市场成交 142.8 万套,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住房平均每套月租金达 3100 元,全市住房月平均租金 491 元 / 平方米,同比涨幅 11%。

报告举例说,2011 年北京人均工资为 56061 元;如果在东城区租一套房子,需要付租金 40896 元,是平均工资的 72.9%;在朝阳区租一套房子,要付租金 37200 元,是平均工资的 66.4%;即使在昌平区租一套房子,租金也要达到平均工资的 43%。

报告称,能租赁成套住房的住户大体是外来人口中的精英群体,即其中的企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但占外来常住人口比例 84.4%的新移民工人,大多数只能选择租住“城中村”的农民住宅、地下室、工棚以及群租房等非正规住房来安身。

住房水平落后经济发展

北京城镇户籍居民开始改善住房质量,而大量的非正式移民和新正式移民还未满足基本的需求。新正式移民住房负担沉重,住房质量较低;非正式移民即外来人口的住房条件低劣。

报告表示,2012 年北京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 13797 美元,但北京住房总体上还相当于西方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水平,住房数量问题还未解决。有部分人开始追求住房的质量,而另外一部分人住在地下室、城中村等非正规住房里,还有部分人选择群租住房,使得北京大量的正规住房非正规化。北京常住居民的收入落后于经济增长,北京住房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各地半年经济分析会密集召开 基建投资唱主角

■ 胡健 报道

宏观经济“中考”临近,各地密集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投资仍是热点话题。

记者发现,在经济下行风险较大的背景下,全国各地在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时,都格外强调投资的重要性。7 月 2 日,中部某省发改委官员告诉记者,“地方稳增长仍然主要依赖投资,出口和消费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投资仍是地方热点

7 月中旬,国务院将根据上半年经济数据把脉今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节奏,各个地方已经率先开始行动。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是各地普遍在年初制定的目标,也是历年惯例,凭借投资的强力拉动,各地完成任务形势较为乐观。

以海南为例,1-5 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实现 909.7 亿元,同比增长 25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4.5 亿元,同比增长 139%。该省投资额和增速几乎都是消费的两倍。

但记者发现,海南投资结构中房地产投资挑起了大梁,前 5 月海南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所占比重为 41.2%,完成投资 3751.5 亿元。

除海南外,6 月底,河北省社科院召开 2013 年上半年河北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四

大攻坚战”研讨会。河北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于刃刚表示,河北现有的产业结构是依托资源禀赋条件、在长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钢铁、石化、建材、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传统制造业不仅现在支撑着河北的国民经济,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还会继续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他说,“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割弃这些产业、通过‘休克疗法’来实现工业转型升级”。

全国各地的经济分析会都在陆续召开,投资仍是热议焦点。

基建投资唱大戏

各地在促投资过程中,基建投资尤其是交通运输业投资最为明显。在海南前 5 月投资中,交通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86%,领跑所有投资门类。

湖南前 5 月全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039.83 亿元,增长 28.1%,同比加快 24.1 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53.3%,同比加快 42.9 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增长 21.2%,同比加快 47.7 个百分点。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经济处于下行阶段,PPI 长期为负,制造业投资动力不足,而基建主要依靠国家规划和地方政策推动,受影响较小。在“经济发展、交通先

行”的指引下,地方上马基建动力较强。

据统计,今年 1-5 月,国家铁路和合资铁路路网建设大中型项目完成投资 1322.65 亿元,为全年计划的 28.5%;比上年同期增加 268.38 亿元,增长 25.5%。

“目前已批准建轨道交通的城市达 36 个,到 2020 年我国轨道交通要达到近 6000 公里的规模,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 4 万亿元。”原铁道部总工程师、中华铁道建设新技术促进会会长华茂口在第二届中国综合铁道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

在过去 3 个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仅 22 个项目核准名单中,就涉及多个地方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有昆明、贵阳、武汉、石家庄等多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以及重庆机场建设等多个地方重点项目。

盲目投资现隐忧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巨大的投资动力遇上了今年流动性紧张的现状,一些隐忧开始暴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利率长期被压低,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有强烈的融资冲动,“宏观经济趋松时,投资纷纷上马;宏观环境从紧时,地方政府更要拉动投资,以山区为主的省份都要去搞工业强省计划”。

湖南省统计局的报告就指出,湖南主

要经济指标增速自年初下滑以来,回升势头较弱,经济增长的动能还不充足。投资方面主要的表现就是项目资金趋紧。1-5 月,湖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增长 19.1%,低于投资增速 7.2 个百分点,比前 4 月扩大 4.5 个百分点。

在很多地方的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找钱”也成为热议议题。全国相当多的地区财政收入目标未达到年度预期,仅从前 5 个月地方财政收支来看,如果不算上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不少地方出现了较大的收不抵支的情况。特别是内蒙古、辽宁等省份财政收入甚至接近于零增长,这与其两位数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差距甚大。

此外,据审计署披露,2012 年高速公路、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债务借新还旧额分别为 453.85 亿元、170.69 亿元,其中 6 个省和 1 个省会城市本级二级公路债务借新还旧率平均 67%。而 18 个省本级及省会城市本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385 万亿元,其中 2011 年以后举借的占 46%,部分地区地方 2012 年需还本付息额已达其可支配土地收入的 1.25 倍。

“经济下行时,投资回报下降,政府的偿债压力加大,届时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经济增长缺乏地理优势的‘边缘地区’。”在陆铭看来,这就容易导致类似欧洲的政府债务危机,盲目投资隐忧已现。